臺大中文學報　第四十一期
2013 年 6 月　　頁 85~124
臺 灣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系

毀滅的城市：論南朝辭賦中的城市書寫與毀滅敘事

祁　立　峰*

提　　要

《文心雕龍・詮賦》說「京殿苑獵，述行序志，并體國經野，義尚光大」，都邑主題自漢代爲辭賦的重要體裁，城市的雄偉恢宏與賦的鋪衍侈麗相得益彰。近年的城市空間論述認爲，城市不僅是地理的概念，其間的場所地景，更與符號、象徵與權力有密切關聯。故筆者從南朝辭賦的城市書寫出發，探索其敘事策略，且發現以下兩點：其一，南朝出現幾篇特殊的都邑賦，它們不若兩漢的富麗恢弘，反而轉向描寫了城市的華麗與毀滅；其二，在經歷眞實的建康城毀滅的浩劫後，作家的城市書寫無不受到都城毀滅的影響，而敘述毀滅的不同面向。總括來看，無論作家的眞實經驗有無，南朝辭賦的城市書寫與毀滅敘事有著密切關聯。而這樣的毀滅敘事，成了南朝作家對身處時代的寓言，也成了後代敘述南朝的重要意象。

關鍵詞：都邑賦、城市空間、〈蕪城賦〉、〈吳城賦〉、〈觀我生賦〉、〈修心賦〉

本文於 101.09.17 收稿，102.02.27 審查通過。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Destructed City: Urban Writing and Destruction Narratives in *Fu* Poems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Chi Li-Feng*

Abstract

Since the Han Dynasty, cities have been a very important theme of *fu* poems, where the majesty of cities and the magnificence of the *fu* genre add additional splendor to each other. This is exemplified by the statement in the "*Fu* on Explaining the *fu* Genre,"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Capitals, palaces, royal hunting gardens, and hunting journeys not only function as records of one's deeds and ambitions but also help to rule the country, so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y carry great meanings." Urban space discourses in recent years further argue that cities are not only a geographical concept; their locations and landscapes are in fact closely connected with symbols, emblems, and power. Therefore, I explore the writing strategies of *fu* poems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hat take cities as their themes, and discover the following two pieces of information. First, despite the importance of richness and grandness in Han *fu* writing, a few special urban *fu* poems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put emphasis on the rising and falling of cities. Second,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fter the suffering of Jiankang's destruction, all urban writers are influenced to write about it in different aspects. In conclusion, urban writings in this period often include destruction narratives, whether their writers have experienced the destruction in person or not. This kind of destruction narratives become Southern Dynasties writers' comments on their era and a significant image for later generations to write about the Southern Dynasties.

***Keywords*: urban *fu* poems, urban space, "*Fu* on the Ruined City," "*Fu* on Wu City," "*Fu* on Contemplating My Life," "*Fu* on Cultivating the Mind"**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毀滅的城市：論南朝辭賦中的城市書寫與毀滅敘事*

祁　立　峰

一、前言：敘述一座城市

當空間成爲社會關係的產物，或者出現充滿情感的地理學書寫，首先讓文學文本相關的空間的描繪可以脫除「太主觀」或「不科學（不是地理事實）」的世俗認定，文學筆法固然不是客觀地呈現區域或地方，但是卻比看似精確的統計圖表更能撐住起當時深刻的社會脈絡與在地經驗。其次，正因爲破除了主／客觀或現實／想像的二元分界，空間無法單純被反應，同樣也無法完全被編造，這應該是個人與空間「相互定義」的文本世界。

——鄭毓瑜：《文本風景》[1]

《文心雕龍・詮賦》談辭賦的流變時說：「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并體

* 本文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毀滅的都城：南朝作家對於『建康』的想像與紀實」（NSC-101- 2410-H-005-034）之研究成果，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寶貴意見。另本文寫作期間，曾獲得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進行暑期進修，於此一併致謝。

1 鄭毓瑜：〈抒情自我的詮釋脈絡〉，收錄於氏著：《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互相定義》（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 年），頁 16。後文引用〈名士與都城：東晉「建康」論述〉與〈市井與圍城：南朝宮廷文化之一側面〉亦徵引自此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經野，義尚光大」，[2]「京殿苑獵，述行序志」作爲辭賦全盛期的主要題材，旨在「體國經野，義尚光大」，[3]接著又說：「孟堅〈兩都〉，明絢以雅贍」、「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都邑賦不僅是辭賦的題材之一，過去研究者就提到，由於辭賦文體侈麗閎衍的特徵，非常適合表現城市在全景敞視下的恢宏雄偉：「賦體的完成作爲都市文明的象徵，也正是作家歌頌都市文明時對文體與描述方式的選擇」、[4]「（因此）漢代以來的都市賦，無不以城市建築與商業文明作爲主體描述對象」，[5]而反過來說，也正因爲都邑賦的宏大敘事架構，「體制宏大、文辭富贍」，[6]恰巧得以充分展現帝國權力以及作家的言辭能力，往往成爲其代表作，故歷代文選經常將之置於賦首。[7]更遑論班固獻〈兩都賦〉，左思「門庭藩溷皆著紙筆」[8]等事。

於此同時我們注意到，城市的書寫同樣於其他學科受到關注。Richard Lehan在《文學中的城市》一書中就認爲「城市以及關於城市的文本，彼此有著不可分離的歷史，而閱讀城市本身同時也是另外一種文本式的閱讀」。[9]而社會學、人文地理學更將作品中的城市書寫，作爲考察社會與文化的佐證，柯蘭（Mike Crang）談「文學地景與地方感」就說：「文學不因其主觀性而有缺陷；相反地，主觀性表達了地方與空間的社會意義。因此，我考察了不同的書

2 梁・劉勰著、黃叔琳注：《文心雕龍注》（臺北：世界書局，1984 年），頁 27。
3 同前註。
4 許結：〈賦體文學與都市文明〉，收錄於《賦體文學的文化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頁 121。
5 同前註。
6 王欣慧：《歷代京都賦的文化審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簡宗梧先生指導，2010 年），頁 3。
7 同前註。
8 唐・房玄齡：《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卷 92〈左思傳〉：「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頁 2376。
9 Richard Lehan, *The City in Literature*（文學中的城市）(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2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寫城市方式，以及不同時期與地方的不同故事形式」，[10] 柯蘭研究雨果、巴爾札克之於巴黎，柯南・道爾之於倫敦，[11] 這是從文學作品到地理學的考察。換言之，作品展現作家對城市的主觀認知、或如本文開頭引用鄭毓瑜所謂「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將作品視爲地理學與城市流變、市民生活的引證之一。

而反過來說，如果書寫城市是閱讀城市的方式之一，那也應該可以談城市如何被建構、「被說（寫）出來」。王毅論中國園林，發現魏晉時的園林已不同於漢代「吞吐山海，包攬天地的空間造型」，[12] 代之而起的是細膩精緻的「紆餘委曲」。[13] 作者心靈會隨著外在環境變遷而改變，對空間的敘述也因之有別。漢代京都賦的恢宏歷歷在目：班固、張衡筆下長安道路「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車不得旋」；宮室「蘭臺金馬，遞宿迭居」、「後宮則昭陽飛翔，……鳳皇鴛鸞」，[14] 這種浩大的「城市書寫」，背後象徵了帝國與政治的權力。那麼到了南朝，作家身處偏安政權，地處江南一隅，他們世界輿圖有了改變，而都邑賦又呈現什麼面貌？是心懷大漢圖騰的歷史想像？[15] 還是專屬於江南的紆餘委曲？

[10] 柯蘭（Mike Crang），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年），頁 58-59。

[11] 同前註，頁 59-70。

[12] 王毅：《園林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頁 97。

[13] 「紆餘委曲」一詞出於《世說新語》：「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丞相（王導）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爲劣。』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爲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 155-156。王毅將之比附六朝園林，同前註，頁 97-102。或許可以類推來說：「紆餘委曲」也代表了其時士人面對空間的心靈狀態。

[14] 以上所引分別爲漢・班固〈西都賦〉和漢・張衡〈西京賦〉對城市道路、宮殿名稱的書寫，本文皆徵引自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頁 602、762。後引辭賦據此版本，僅注作者篇名。

[15] 關於南朝作家所召喚的歷史與漢代圖騰等論述，如王文進：〈南朝文人的「歷史想像」與「山水關懷」——論邊塞詩的「大漢圖騰」與山水詩的「欣於所遇」〉，收錄於《南朝邊塞詩新論》（臺北：里仁書局，2000 年），頁 239-262 以及《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臺北：里仁書局，2008 年）的幾篇論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故本文「敘事」的角度，透過兩個層次探討南朝辭賦中的都邑書寫：首先第一個層次：筆者發現南朝作家書寫城市，不同於漢代京都賦的鋪衍風格，而著重富麗華美以及隨之到臨的毀滅，如鮑照（421-466?）與吳均（469-520）；第二層次則是：前面提到的作家未必有眞實的災難經驗，但侯景之亂（548）後，南朝作家熟悉的都城「建康」遭到毀滅，作家將眞實的毀滅經驗代入侈麗鋪張的辭賦之中，如沈炯（503-561）、庾信（513-581）、江總（519-594）和顏之推（531-591）。這兩種層次的毀滅敘事如何呈現？有何異同？這是本文所要探討的。而從「作家」的角度來說，作家書寫一座（眞實或想像的）「城市」，城市書寫帶給作家什麼意義？而當作家見證了熟悉城市的毀滅時，其心態又產生何種轉折？這也是本文要探討的。

因此，即便城市的功能是讓人們得以居住，但我們也可以說：居民生活在城市之中，也反身建構了一座城市。田曉菲談南朝作家如何用「採蓮」這個題材來呈現江南地景時，曾說到：

> 對後人來說，江南之「空」因爲種種歷史事件的發生，而不僅僅是一個比喻性的說法，我們知道南朝終於覆滅，江南被蹂躪踐踏。如果對於蕭綱和他同時代人來說，江南是一個近在眼前的世界，江南予人的快樂是眞實可感的，然而，他們塑造出來的江南形象到了後世，卻因爲我們的歷史知識而帶上了一層哀婉感傷的色彩。[16]

江南的快樂是眞實可感的，而南朝覆滅、建康城破也同樣是歷史事實，但在經歷之前與之後，眞實經驗的無或有，寫實與再現，都摻雜了各種跨越歷史維度的想像，進而造成書寫的差異。下文先談南朝作家的都邑賦與漢代有何區別，其次談建康城這個對於南朝作家而言眞實熟悉的都城，其毀滅前後的敘事差異。

[16] 田曉菲：《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化與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2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華麗的城市及其毀滅結局——兩座「吳／蕪城」賦

自左思後，東晉到南朝作家書寫都城賦顯然並不多見。過去辭賦史認爲南朝是抒情小賦時代，但筆者以爲從沈約讓王筠讀〈郊居賦〉、或禿髮傉檀子作〈高昌殿賦〉[17]等文獻來說，南北朝時代仍然對大賦——尤其是體國經野式的侈麗書寫頗爲重視，將之視爲作家的能力與才華的展現。只是時代背景與文學環境實在不適合兩漢那樣的都城大賦誕生。因此南朝的都城賦轉變成爲了另外一種型態，語言雕飾、篇幅短小，且從本文所談的鮑照與吳均城市書寫來看，華麗的建置與毀壞的結局又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創作內容有時未必需要親身體驗，可以透過類比與想像達成，因此或許不能說鮑照與吳均必定不能書寫都邑毀滅的主題。但比起梁、陳之際身世飄零、南北羈旅的作家，鮑照和吳均活躍的元嘉、天監年間，堪稱南朝的承平時期。但特殊的是：〈蕪城賦〉與〈吳城賦〉表述了一個共同點，即是諸外界色最後終將走向「壞空」的結局。[18]陰錯陽差地，這樣的走勢也正是江南王朝最後的結局，對作家來說，如果透過廢墟可以想像過去的繁華，那麼靜好的當下同樣預視了毀壞的未來。

---

[17] 沈約對其〈閒居賦〉中的瑋字與破音等創作頗爲得意，據唐・姚思廉：《梁書》，卷33〈王筠傳〉：「（沈）約制〈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五激反）連蜷』。……約曰：『知音者希，眞賞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頁1056。宋・李昉《太平御覽》：「禿髮傉檀子歸，年十三，命爲〈高昌殿賦〉援筆即成，影不移漏，傉檀覽而異之，擬之曹子建。」《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頁2841。

[18] 若以佛家的「空」來說，毀滅與「壞空」僅是「空」的詮釋之一，牟宗三認爲「空」的核心義是「空不得爲實體化」：「說它（空）是一個道理，如說『空理』（空性，以空爲性），意識不客觀存有的實在之理，是故對於『空』不能實體化，實體化之，即是執著。」參氏著：《佛性與般若》（臺北：學生書局，1997年），頁154。因此，本文討論的「毀滅敘事」或許與佛教流行有些關聯，但筆者並不認爲「毀滅」的書寫全是來自於佛學影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準備毀壞的華麗：鮑照〈蕪城賦〉

鮑照〈蕪城賦〉的「蕪城」指廣陵城。劉宋時竟陵王劉誕在廣陵建城，之後宋孝武帝劉駿派沈慶之出兵攻城，廣陵遂成廢墟。[19] 此事對鮑照而言所去未遠，所以作品寫出了極盛極衰的對比。Stephen Owen 說「舊注以爲『蕪城』指的是廣陵，不過從賦文裏找不出任何證據來肯定這一點」，[20] 換言之，這種「單一贅述」的技巧正象徵著——「蕪城」可能是歷史地理上任何一座城市。這種興衰無常、曾經華麗最後歸於頹壞的經驗，有可能到處都存在。

也因此 Owen 說這篇賦呈現的是一種「自然規律成長」，[21] 是「城牆壕溝之中不勝枚舉的故事，關於隨之而來攻破與侵入這些障礙物的、『瓜剖』的故事」。[22] 在書寫蕪城的前半段，作者用的是典型兩漢都邑大賦的策略，寫城市過往的地勢、交通、經濟與人文環境的各種富饒景觀：

> 澜迤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雁門。柂以漕渠，軸以崑崗。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轊，人駕肩。廛閈撲地，歌吹沸天。學貨鹽田，鑪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鮑照〈蕪城賦〉）[23]

---

[19] 關於此事，《宋書》、《南史》都有相關記載，然而宋・司馬光寫廣陵圍城與城破，尤爲生動：「……（沈）慶之焚其東門，塞塹，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值久雨，不得攻城。」《資治通鑑》（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年），頁 4047；「廣陵城中士民，無大小悉命殺之。沈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其餘男子皆死，女子以爲軍賞；猶殺三千餘口。長水校尉宗越臨決，皆先剖腸抉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創，然後斬之。」《資治通鑑》，頁 4048。所以對於鮑照而言，廣陵城滅不僅是景物的破敗凋零，也包含了死者亡靈的詭譎氣氛。

[20] Stephen Owen：《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6 年），頁 85。

[21] 同前註，頁 86。

[22] 同前註，頁 92。

[23] 劉宋・鮑照：〈蕪城賦〉，引自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268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這樣由各種層次的富麗地景組成的空間，一如過去京都賦對長安、洛陽的書寫。[24] 研究者說的「引入不屬於某一特殊時間的循環」，換句話說，就是「去特定城市化」，這座「蕪城」無論是虛擬或眞實存在都無所謂，它就是一種典型。廖蔚卿說此賦描述了一切人類整體創建而努力最後成爲「毀滅的孤絕情態」，[25]「這是必然的命運，不可抗拒的自然律」。[26] 蕪城同樣以都邑大賦的華麗恢宏展開敘述，然而與漢賦不同處在於：追憶這座城市過去的雄偉，卻是爲了準備、爲了烘托眼前的頹圮。其中自然包括「後人復哀後人」[27] 的感傷預視、或「登臨懷古」的孤絕情懷，但從本文脈絡中的毀滅敘事切入，〈蕪城賦〉轉折即在「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此兩句之後：

> 澤葵依井，荒葛罥塗。壇羅虺蜮，階鬬麏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趨。飢鷹厲吻，寒鴟嚇雛。伏虡藏虎，乳血餐膚。……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鮑照〈蕪城賦〉）

這裏引述〈蕪城賦〉關於毀滅的片段，大概可再分爲兩個層次，「澤葵依井」在寫此城頹圮荒蕪的現況。鮑照寫這些殘破而衍生出來的雜草蟲虺或野獸，是有序列的。「澤葵」、「荒葛」不過是野草藤蔓，但傳說「蜮」會含沙射人影，「木魅」會幻化形體欺人，廣陵城荒蕪至此，已不僅是表面的斷垣殘壁或

[24] Stephen Owen 說鮑照描寫的「蕪城」很容易使人以爲他描寫的是漢朝的京都長安洛陽，或劉宋的京都建康，但 Owen 不認我們應爲將賦的「昔」如張珖般解釋爲「吳王劉濞叛亂」，而是「把我們從眞實的歷史上引開，引入不屬於某一特殊時間的循環運轉中去」，《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頁 85。

[25] 廖蔚卿：〈論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兩大主題〉，《漢魏六朝文學論集》（臺北：大安出版社，1997 年），頁 76-78。

[26] 同前註，頁 81。

[27] 這是杜牧〈阿房宮賦〉中著名的結語：「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引自清・董誥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77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蛛網青苔，靈異幽魅的氛圍瀰漫整個空間。

而以「凝思寂聽，心傷已摧」作爲轉折後，作者不再寫荒涼與孤寂，而要敘寫今昔對照。一切堅固的（或華麗的）事物都煙消雲散了，[28] 亭臺舞榭、假山造景，原本華美的園林、音樂、器玩與歌聲，它們以大賦的宏衍技巧被鋪陳出來，卻像是爲了被破壞而誕生。朱曉海發現〈蕪城賦〉是興盛與荒涼辯證的最終點，是「正→反→合」的最後階段，[29] 但本文以爲更重要的是那對曾經存在而終於毀滅的敘事本質。

而最具毀滅性的描敘，在於賦末的「東都妙姬，南國麗人」，再怎麼蕙質蘭心，最後只能化作塵土骷髏。這類型美人化枯骨或玉石的描敘，在六朝志怪中就曾出現過，[30] Stephen Owen 說這就是關於「物」的追憶與歷史，但我們應該注意到：鮑照將想像的場景搬演出來，「再現」了過去的繁盛之城：「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視覺的、聽覺的，甚至晶瑩肌膚眞實可感的觸覺，它們鋪衍之目的不再僅是爲了辭賦的鋪張侈麗，而是強化毀滅到來之時，諸色皆空，萬界俱滅的強烈對比與濃郁感傷。「天道如何，吞恨者多」，即便壞空是無以避免的大多數結果，但就是因爲它們曾經是那麼美好，所以毀滅時的衝擊與遺恨也顯得異常巨大。

（二）致敬的廢都：〈吳城賦〉

吳均的「吳城」寫的是戰國時吳國的都城，吳城當在今日蘇州一帶。對於

[28] 此處筆者借用伯曼（Marshall Berman）談現代性與現代主義的巨作之書名，《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而這句話出自共產黨的宣言。

[29] 朱曉海：〈自東漢中葉以降某些冷門詠物賦作論彼時審美觀的異動〉，收錄於氏著：《習賦椎輪記》（臺北：學生書局，1999 年），頁 276。

[30] 如《搜神記》談生夜以燭火照女子：「盜照視之：其腰已上，生肉如人，腰已下，但有枯骨。」王根林校點：《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404。《列異記》：「江嚴於富春縣清泉山，遙見一美女，紫衣而歌，嚴就之，數十步，女遂隱，唯見所據石。如此數四，乃得一紫玉，廣一尺。」引自魯迅：《古小說鉤沈》（香港：新藝出版社，1967 年），頁 1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吳均而言，吳國這千年之前即隳滅的帝國，當然很遙遠，所以辭賦寫來瀰漫著孤寂荒涼的氣氛。但這樣的氣氛又隱隱然地與鮑照勾勒的「蕪城」有些關聯：

> 古樹荒煙，幾百千年。云是吳王所築，越王所遷。東有鑄劍殘水，西有舞鶴故壖。縈具區之廣澤，帶姑蘇之遠山。僕本蓄怨，千悲億恨。況復荊棘蕭森，叢蘿彌蔓。亭梧百尺，皆歷地而生枝。階筠萬丈，或至杪而無葉。不見春荷夏槿，唯聞秋蟬冬蝶。木魅晨走，山鬼夜驚。不知九州四海，乃復有此吳城。（吳均〈吳城賦〉）

吳均筆下的「吳城」，相對於「蕪城」的地理廢墟，「吳城」更是一座歷史廢墟，他用「木魅山鬼」、「秋蟬冬蝶」，有些向鮑照致敬的意味。「鑄劍」用干將、莫邪的典故，而「舞鶴故壖」是吳王闔閭舞鶴於市，以生民殉葬其女藤玉的典故。根據《吳越春秋》的記載，這是一段極超現實的故事：「（闔閭）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31] 白鶴如何能受操縱起舞，此說甚爲靈異而超現實。然而萬民隨鶴舞而行進、活人祭獻送葬隊伍入墓門的死亡之旅，替這座歷史中的吳都描繪，增添了荒涼死寂的氣氛。

吳均本身是一個喜歡語言遊戲的創作者，擅長鋪排典故或地理詞彙，他的邊塞詩和寫景詩都可見此點。[32] 但他刻意選擇了陰寒森冷的風格來書寫吳城的興衰消長，某種色澤黯淡、瀕臨死亡的敘述視角瀰漫於賦中，這點讓「吳城」不同於「蕪城」，「蕪城」的毀滅敘事在於它曾經的華麗堂皇，而「吳城」千年以來就停滯在這樣的蕭瑟氣氛之中，再不見「春」、「夏」的代表植物，只剩「秋蟬」、「冬蝶」——這猶如希臘神話中，冥王將春神泊瑟芬（Proserpine）帶至亡界，而人間再無春天的故事。季節、建築、或動植物，整座荒城廢都停留在毫無生氣的時空之中。

吳均筆下的吳城，最後被隱藏在歷史與空間之中：「不知九州四海，乃復

[31] 漢・趙曄：《吳越春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年），頁 34-1、34-2。

[32] 請參拙著：〈經驗匱乏者的遊戲：再探南朝邊塞詩的成因〉，《漢學研究》第 29 卷第 1 期（2011 年 3 月），頁 3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此吳城」，這一方面是作者對現世的警告，一如杜牧〈阿房宮賦〉提出的警語。但更重要的是作者藉著對這座歷史著名廢都的書寫，呈現了一種極致的荒涼和虛無之感。還有什麼比「消失」本身來得更爲毀壞、滅絕與荒涼？筆者以爲這樣的敘事已經不同於 Stephen Owen 說的自然法則，或「現場」的熱情與「不在場」的嫉妒，[33] 這是一種更爲徹底的「毀滅敘事」——吳城連最後的廢墟都即將消失於時空之中。

然而要補充的是：南朝作家同樣有謳歌都邑的辭賦創作，至今仍可見到曹毗〈揚都賦〉、[34] 夏侯弼〈吳都賦〉以及蕭子範〈建安城門峽賦〉等殘篇。但相對來說，兩篇「蕪／吳城」保留地更爲完整，或許將因果反過來說，毀滅敘事讓作者有了新穎且擅長發揮的視角、意象與話語。在賦中作者提醒我們：一座無論再怎麼繁盛的城市，終究會有走向毀壞死絕的一日。而將曾經華麗而終於荒蕪的感傷記載下來，就成爲兩篇「蕪／吳城」的題旨。

當然，面對毀壞以及隨之而來的感傷，不同作者仍有不同詮釋——像鮑照「心傷已摧」或吳均「千悲億恨」。但在此同時，荒蕪的城市成爲了他們情感的載體，成爲他們興發感傷情緒的背景音樂。曾經繁盛卻終於毀滅的城市廢墟，深刻召喚了創作者進入此題材。同樣的靈異精怪敘述，我們已看不到北朝作家描寫宮殿的那種「土成黼黻，木化蛟螭」、「木神水怪，海若山祇」[35] 等等「千變萬化」的魔幻與華麗，鮑照與吳均的華麗僅爲了敘述其後荒涼與毀滅。

---

[33] Stephen Owen 稱鮑照〈蕪城賦〉：「昔日的繁華引起了嫉妒的怒火與慾望——由於沒有分享到他們所享受的快樂而發怒，渴望自己也能有這樣的快樂，怒氣表現爲關於罪過與懲罰的故事。」氏著：《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頁 91。

[34] 關於曹毗〈揚都賦〉，《晉書》稱之「亞於庾闡」，雖然經典保存或許有各種因素，然而相對來說，筆者認爲毀滅敘事代表的是一種新的意象、話語。相較來說，典型的大賦恢宏敘事已經是一種舊有習見的書寫體式了。

[35] 此乃北魏・邢劭的〈新宮賦〉，此段寫鄴城新宮的奇詭、宏大與華麗，如今僅剩殘文：「土成黼黻，木化蛟螭。布紅紫之融泄，閒朱黃之赫曦。獸狂顧而猶動，鳥將騫而以疲。木神水怪，海若山祇。千變萬化，殊形異宜。」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38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裏談兩個作家對於荒城的書寫，他們未必有離亂經驗，但毀滅卻瀰漫在其字行間。接著本文要談南朝的政治權力中心「建康」，建康隨著動亂被毀，這是千眞萬確的經驗，經歷亂事的作家又如何描寫？在此之前，先來談談建康之於南朝的意義。

三、都城「建康」——南朝文學的「建康」書寫

誠如人文地理學的說法：空間不僅是地理的，也是心理與感覺的。而城市也不僅提供市民居住空間，更有權力、象徵等符號意義，就像 Gottdiener、Lagopoulos論著所提：「任何建築與城市，在意指的層次都成了其功能的所指，然而於功能用途之外，還有一作爲符號的意義。」[36]「建康」從東晉至南朝作爲江南帝國的首都，當然有政治、經濟與地勢等考量，但建康作爲都城，實有一更超現實的勘輿學考量，即所謂的「金陵王氣」。建康以及南朝的帝王氣到了唐詩被描摹成感傷或悵然的對象，像劉禹錫「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或李商隱的「金陵王氣映瑤光」，但建康的王氣是從何而來？它的象徵和符號又對如何影響作家書寫與看待建康？這是本節所要探討的。

（一）金陵王氣

關於建康金陵王氣之說的起源，劉淑芬與程章燦都據《景定建康志》談到楚威王和秦始皇對此地的堪輿。[37] 明確述及建康與帝王關聯在於《三國志》

---

[36] M. Gottdiener and Alexandres ph. Lagopoulos, *The City and the Sign: An Introduction to Urban Semiotics*（城市與符號：城市符號學導論）,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0.

[37] 參見宋・周應：《景定建康志》（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21-23，相關探討與歸納，請參見劉淑芬：〈六朝建康城的興盛與沒落〉，氏著：《六朝的城市與社會》（臺灣：學生書局，1998 年），頁 35；程章燦：〈金陵王氣〉，《古典文學知識》（2002 年 1、2 期），頁 144-1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東吳郎中令陳化對魏文帝說的「紫蓋黃旗，運在東南」。[38] 到了南齊，仍有能望氣者，稱建康內部的新林、婁湖、東府西三地有「天子氣」，「東府西」靠近青溪，於是齊武帝蕭賾就聽其言，於青溪築舊宮，於新林、婁湖築苑以遊覽之。[39]

對於一座具有帝王象徵、足以作爲帝國中心的都城，自得有辭賦以歌詠之。東晉庾闡曾作〈揚都賦〉，大抵是用兩漢都邑賦的體國經野來描寫建康。《世說新語》中〈揚都賦〉的「可三二京，四三都」[40] 評價，足見其於當時所受重視：

> 昔句吳端委，延州儷臧，高讓殆於庶幾，英風亞乎穎陽。土映黃旗之景，巒吐紫蓋之祥。巖棲赤松之館，岫啓縉雲之堂。龍符渙而夏德興，群神萃而玉帛昌也。天包龍軫，地奄衡霍。玄聖所遊，陟方所託。我皇晉之中興，而駿命是廓，靈運啓於中宗，天網振其絕絡……。（庾闡〈揚都賦〉）

「黃旗之景」、「紫蓋之祥」很明確地徵引了金陵王氣的說法，將帝國、權力、空間與城市緊密結合。其實〈揚都賦〉的書寫敘事不過就是典型的都邑大賦架構，但根據鄭毓瑜的說法：庾闡這篇賦除了呼應「歷時」的都邑賦傳統，但更核心的策略在於「共時」的政治意向，此意向性就隱藏在「一統帝國意識及誇炫資產的物欲文化」[41] 之背後，表述了當時紛亂的權力關係：

> 歷來透過京都賦這樣的書寫體式，主要目的在「宣上德以盡忠孝，雍容

[38] 晉・陳壽：《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79 年），〈吳書〉卷 46〈孫權傳〉：「陳化爲太常，化字元耀，汝南人……爲郎中令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頁 1131。

[39] 唐・李延壽：《南史》，卷 5〈齊武帝本紀〉，頁 116。

[40] 《世說新語》：「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爲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爲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頁 258。

[41] 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互相定義》，頁 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揄揚，著於後嗣」，完全爲君王及其所掌控的政權體制服務。……〈揚都賦〉顯然不同於歷來京都論述，完全是爲了成就君王權力的宣示中心。王導於蘇峻亂後曾以建康「王者之宅」反對遷都，但是從當時的決策過程來看，「不宜遷都」顯然是王導的立場而成爲定論。[42]

鄭毓瑜此段說的是都城與王權的「模糊游移關係」，[43] 也就是說，城市與王權、帝國以更複雜的關係連結在一起。而理解這篇謳詠金陵王氣的辭賦，就必須掌握前後因果。鄭毓瑜此段說的蘇峻之亂與王導駁遷都之議，出於《晉書・王導傳》，成帝咸和二年，蘇峻爲亂而禍及建康，亂平後，朝臣始有遷都之議。當時三吳豪族提議會稽；平亂有功的溫嶠建議豫章，但王導反對：

> 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裏，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虛矣。且北寇遊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44]

王導論辯的主軸在於：建康不僅是一座城市，「王者之宅」更有其歷史的符號意義。鄭毓瑜引述劉淑芬〈六朝建康的經濟基礎〉的說法，遷都較富庶的豫章、會稽，固然有優點，但鄭毓瑜提到：王導的堅持象徵東晉初期「臣強君弱」的政治現實，「都城」原本是（君主和帝國）權力中心的象徵，但此處「遷都／不遷都」的爭論，成了一個反概念，折照出了君主權力弱化的現實。[45]

但我們將這個反概念還原來說：建康依然是「中心」、是洛陽以外「唯一」的第二選擇，「王氣」或許流於抽象，但城市地景場所的歷史感卻不容抹滅。那麼，庾闡〈揚都賦〉或許有諂媚權臣的意圖，但顯然「三二京，四三

[42] 同前註，頁 34、38。
[43] 同前註，頁 38。
[44] 唐・房玄齡：《晉書》，卷 65〈王導列傳〉，頁 1751。
[45] 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互相定義》，頁 38-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都」的溢美之言不僅是對辭賦來說，更指涉的是作爲權力中心（姑且不論此「權」是否還等同於君權）的、作爲「首都」符號的建康。

從鄭毓瑜論〈揚都賦〉的視角，可以發現城市作爲作家生存活動的空間，其表裏的寓意與作品的時空背景或作者的意圖心態，彼此交揉而密不可分，書寫城市本身就成了一種寓言的製作，就像王導所設計的建康通衢「紆餘委曲」，[46] 這同樣象徵了南朝作家迂迴曲折的心靈路徑。而從「金陵王氣」到「若不可測」，建康的非凡、神秘與神聖，是否隨著災禍和南朝的衰亡而瓦解？或繼續指向了更複雜、歧義的符號而被書寫流傳？比起樂府常見的長安、洛陽，南朝作家對建康的書寫並不多，這當然和王文進談的大漢圖騰與歷史想像有關。[47] 但觸及建康時，作家又如何書寫他們的都城呢？

（二）建康書寫

南朝作家書寫建康的都城辭賦，大概僅夏侯弼〈吳都賦〉一篇，而今僅存殘文。從「巖巖船艫，汎汎揚舟」、「堅壁金城，狀若高樓」[48] 的形容來看，應當是在從地勢險峻、舟楫舳艫等江海氣氛來歌頌吳都。根據王欣慧的看法，從賦中「名練奪乎樂浪，英葛光乎三輔」句來看，有可能在推崇劉裕北伐功績。[49] 但除了夏侯弼〈吳都賦〉之外，我們還是可以從南朝幾篇非以都邑爲題的辭賦中，找到關於建康的敘述。它們未必若庾闡〈揚都賦〉那樣隱喻了軍事政權中心，提到建康部分或許有限，但同樣以恢宏賦筆來勾勒建康的形象，像江淹和陶宏景：

若乃旭日始暖，蕙草可織。園桃紅點，流水碧色。思舊都兮心斷，憐故

[46] 相關原著參酌前引註 13。

[47] 王文進提出：比起投射到了「洛陽」、「長安」等漢代都城，南朝詩歌甚少提到「建康」、「金陵」，並非創作者不善於描寫歌舞昇平、富麗堂皇的南方，而是因爲創作者將這樣的意象投射到了歷史，王文進：《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頁 164-165。

[48] 引自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2597。

[49] 王欣慧：《歷代京都賦的文化審視》，頁 1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兮無極。至若炎雲峰起，芳樹未移。皋蘭生坂，朱荷出池。憶上國之綺樹，想金陵之蕙枝。及夫秋風一至。白露團團。明月生波。螢火迎寒。眷庭中之梧楸。念機上之羅紈。至於冬陰北邊，永夜不曉。平蕪際海，千里飛烏。何嘗不夢帝城之阡陌，憶故都之臺沼。是以軫琴情動，戛瑟涕落。逐長夜而心殞，隨白日而形削。故秦人秦聲，楚音楚奏。聞歌更泣，見悲已疚。（江淹〈四時賦〉）

江淹〈四時賦〉以「旭日始暖」、「炎雲峰起」、「秋風一至」、「冬陰北邊」描寫四季，就客觀的認知「四季」是無分空間地理的，但自從《楚騷》開始，春夏秋冬之冷暖似乎與空間緊密地結合。江淹曾出任吳興令，此時作〈去故鄉賦〉、〈待罪江南思北歸賦〉[50] 等，緬懷故鄉與北歸，弔詭的是「北歸」指的就是他熟悉的都城建康，而「江南」成爲了相對的南方。所以帝城之阡陌和北方形象也可以連結在一起，成爲江淹念茲懷茲的對象，一念及則要「動情」、「落涕」。金陵的春意與繁華，對作者而言依依難忘。

建康在後來敘事裏的另一個形象就是其地處長江天險。像李白「吳關倚此固，天險自茲設」和李商隱「天險悠悠地險長，金陵王氣映瑤光」，雖然經過田曉菲的解讀，義山詩多了一層對現實事件發展的反諷。[51] 陶宏景的〈水仙賦〉這麼敘述建康：

及秋水方至，層濤架山。各巡封隩，來賚王言。選奇於河戾之府，出寶於驪龍之川。夜光燭月，洪貝充轅，亦其壤矣。若夫層城瑤館，縡雲瓊閣，黃帝所以觴百神也。塗山石帳，天后翠幙，夏禹所以集羣臣也。岷嶓交錯，上貫井絡。窮漢碉磴，橫帶玉繩。浸湯泉於桂渚，涌沸壑於金陵。崩沙轉石，驚湍走沫。絕壁飛流，萬丈懸瀨。奔激芒碭之閒，馳騖壺口之外。逮乎璇綱運極，九六數翻。（陶宏景〈水仙賦〉）

陶宏景顯然對於建康城的地勢天險、龍蟠虎踞甚爲熟悉，在他的〈許長史舊館

50 梁・江淹：〈待罪江南思北歸賦〉有「願歸靈於上國，雖坎軻而不惜身」，「上國」與「憶上國之綺樹」彼此相呼應。

51 田曉菲：《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化與文學》，頁 329-33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壇碑〉，描寫許長史舊館景觀，但「東際連岡，北橫長嶺。柳汙陽谷，俱會西垂。四域之內，皆謂之金陵地肺者也」，也在形容金陵山勢地形，而這可以和〈水仙賦〉呼應。〈水仙賦〉中的金陵其實只是標明地理位置，要形容水勢洶湧波濤，而金陵方渚正是目擊「崩沙轉石，驚湍走沫」的據高點。過去研究者已經注意到江南空間與「渡江」此一行動代表的越界經驗，[52] 以及「江水」所引動南朝辭賦家的心理因素與國家想像，[53] 對本文來說，這篇賦表示了建康與長江天險這兩個意象有了緊密的交集。即便梁朝易代後，徐陵仍在〈冊陳公九錫文〉之中說「雖金陵佳氣，石壘天嚴。朝闇戎塵，夜喧鉦鼓」，[54] 談金陵王氣，談石頭天險。

克特金（Joel Kotkin）於《城市的歷史》提到偉大城市所具備三個條件：「神聖」、「安全」與「繁榮」。[55] 安全是軍事的意義；繁盛是經濟的意義，從辭賦中我們看到建康的地勢固若金湯，但南朝也不乏對建康的「繁榮」書寫，如沈約〈長安有狹斜行〉的「青槐金陵陌，丹轂貴遊士」；[56] 謝朓〈永明

[52] 高莉芬：〈水的聖域：兩晉江海賦的原型與象徵〉，《政大中文學報》第 1 期（2007 年 12 月），頁 135-141。

[53] 王欣慧：「茫茫江水，何以能引發百感諸慮，伯梅（Gernot Bohme）的氣氛美學或許可資參照，伯梅談『氣氛』時曾提出『物的外射作用』以解釋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以『長江』爲題的賦篇以前所未有的數量出現在東晉賦壇，如郭璞、袁喬的〈江賦〉，庾闡、曹毗的〈涉江賦〉。與士人過江之際的迷惘之情、憂國之心不同，賦家企圖將茫茫江水營造成另一種茫茫蕩蕩的氣氛。……透過這些意象的組合，長江展現的是開闊的、激昂的、充滿希望的氛圍，是東晉泱泱大國之姿。」《歷代京都賦的文化審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簡宗梧先生指導，2010 年），頁 142-143。

[54] 引自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3433。

[55] 此處據克特金（Joel Kotkin）的說法：「本書提出決定城市興衰的三大要素，具備宗教場域、提供庇護及施展權力、刺激貿易活動。若具備這三大要素，都市文化便會蓬勃發展，反之，便會產生危機，城市也將逐漸沒落。」克特金（Joel Kotkin）、謝佩妏譯：《城市的歷史》（臺北：左岸文化事業公司，2006 年），頁 35。神聖或許與西方宗教傳統有關，此處暫且不論。

[56] 引自清・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 年），頁 16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樂〉的「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綠水，迢遞起朱樓」，[57] 後來杜甫屢次轉化、解構了江南和建康的繁盛意象，像〈秋興〉的「回首可憐歌舞地」或〈夢李白〉的「江南瘴癘地」。

建康符合了一座城市的必要形象，而南朝到唐朝，無論「佳麗」或「瘴癘」，共同建構了建康的多元意象。對南朝作家而言，建康的朱樓綠水，甍瓦柳條，是眞眞實實存在的，並非像唐詩「六朝如夢」般僅止於夢境。金陵王氣、天險地勢，都讓這座城市充滿了各種象徵。然而建康的毀滅卻也是歷史的事實，江淹、陶宏景或謝朓當然不及經歷，所以他們寫出了建康作爲都城的雄偉意象，但對不幸親歷此禍的作家而言，他們又怎麼書寫建康，而他們的毀滅敘事與鮑照、吳均有何不同？

四、眞實的災難經驗——作家對建康的毀滅敘事

西元 548 年侯景亂起，隔年三月，建康被圍百日仍遭攻陷。以建康來說，圍城時水淹火燒、勤王軍於城外猜疑觀望的現實，以及城破後「死者什八九」、「橫尸滿路，爛汁滿溝」[58] 的慘況，這都是歷史事實。在《梁書・朱异傳》保留一篇蕭綱於圍城期間，「築長圍絕內外」時寫的〈圍城賦〉末段，蕭綱以「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爲誰？」[59] 指涉建康城的內憂外患。鄭毓瑜說這個「圍」將動盪的建康隔成兩個世界：「內裏盡是笙歌樂舞，流香鑠金」，[60]「在外的戰亂、死寂、啼號，以及爲洪波掩灌的御闕、爲戰火焚燒的火城——建康」。[61]

57 同前註，頁 1414。

58 宋・司馬光：「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滿四千人，率皆羸喘。橫尸滿路，不可瘞埋，爛汁滿溝。而眾心猶望外援。」《資治通鑑》，頁 5008。

59 唐・姚思廉：《梁書》，卷 38〈朱异傳〉，頁 539。

60 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互相定義》，頁 112。

61 同前註，頁 1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誠如研究者所說，創傷經驗就是要表現痛苦的「不可再現和難以言傳」，[62] 當南朝作家親歷或追憶這段自己親身見證的毀滅時，他們如何寫實或再現這樣的災難，以及災難落實於城市中的形象？即便談庾信〈哀江南賦〉、顏之推〈觀我生賦〉此兩賦的研究成果不少，但本文將聚焦談他們建康毀壞以及其後發展的這一段敘述，以及對空間、場所的描摹。

（一）地景與國家的崩毀：庾信與顏之推

1. 庾信〈哀江南賦〉

庾信〈哀江南賦〉和顏之推〈觀我生賦〉除了都描敘侯景之亂和城市毀滅外，還有許多共通處。兩賦都頻繁運用了大量典故作爲敘事策略，姑隱了眞實歷史，改寫了浩劫現場。不過顏之推因讀者或不明其所指涉的眞實歷史，賦中有自注本事。[63] 但庾信則全以繁複曲折來敘述他的眞實經驗，即便像以下這一段在寫建康自遭圍爾後城破的過程，這分明是他親身所經歷，但密集的典故，幾乎遮蓋了眞實的事實發展：

> 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竟遭夏臺之禍，終視堯城之變。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平戎之戰。陶侃空爭米船，顧榮虛搖羽扇。將軍死綏，路絕長圍。烽隨星落，書逐鳶飛。遂乃韓分趙裂，鼓臥旗折。失群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嬰城，謀臣卷舌。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蛇奔穴。五郡則兄弟相悲，

[62] 這是王德威談創傷的說法，氏著〈傷痕書寫，國家文學〉中引阿多諾名言：「奧許維茲（Auschwitz）之後，詩不再成爲可能。」然後說：「不該發生的已經發生了，千言萬語哪能說得盡令人無言以對的創傷？」王德威：《一九四九：傷痕書寫與國家文學》（香港：三聯書店，2008 年），頁 67-68。

[63] 關於顏之推的「自注」，錢鍾書曾說：「之推自註此賦，嚴謹不苟，僅明本事，不闡入典故。蓋本事無自註是使讀者昧而不知；典故有自註，是疑讀者陋而不學。」錢鍾書：《管錐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271》（臺北：書林圖書公司，1990 年），頁 15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州則父子離別。（庾信〈哀江南賦〉）[64]

根據倪璠的注，這一段主軸在說梁武帝遭困於臺城，蕭氏宗親擁兵不救。王琳、羊鴉仁勤王失利以及羊侃守城等史實，但庾信用陶侃、顧榮、劉秀和王莽、田單和慕容垂等典故，[65] 歷史事件穿越時空，類似的場景於過去即有，但卻怎麼會眞實發生在眼前？可以看出庾信刻意要隱藏敘事者的身影，也同時隱藏了「建康」這個地方感受。

在這場庾信分明親眼目睹的戰役與動亂中，他搬演了「王莽驅象而戰」、「田單死守即墨」的譬喻，迂迴閃避了現實世界。但〈哀江南賦〉敘事本身仍富有描摹張力，像「夏臺之禍，堯城之變」或「兩觀當戟，千門受箭」這樣的意象，那坐困愁城和街衢巷戰的場景，護軍全家戰死，末將兄弟殉國，幾句話就勾勒出血肉糢糊、屍橫遍野的場景。我們目睹了「鼓臥旗折」、「失群班馬」：旌旗戰鼓被拆徹折毀、兵車戰馬失序倒轍的大混亂、大毀滅。而這些意象、這些細節，具體而形象化地旁敲側擊出了一個現場——即是建康城的殞落。這種毀滅和前面吳均、鮑照那種既成的廢墟荒都有所差別，它是正在進行，且不斷往崩壞一端前進著：

> 尚書多算，守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師之臥牆。大事去矣，人之云亡！申子奮發，勇氣咆勃，實總元戎，身先士卒。胄落魚門，兵填馬窟，屢犯通中，頻遭刮骨。功業夭枉，身名埋沒。或以隼翼鶟披，虎威狐假。霑漬鋒鏑，脂膏原野。兵弱虜強，城孤氣寡。聞鶴唳而驚心，聽胡笳而淚下。（庾信〈哀江南賦〉）[66]

「大事去矣，人之云亡」僅兩句八字，說得卻是建康城戰的轉折，於是「兵填馬窟」、「身名埋沒」、「城孤氣寡」一連串的頹倒、歪斜、挫敗的敘事，都指向了亂起城毀、一塊巨大拼圖片片隕落的細節。過去對庾信〈哀江南賦〉的

[64] 引自清・倪璠：《庾子山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120-125。
[65] 相關典故與指涉，本文皆根據清・倪璠：《庾子山集注》，頁 120-129。
[66] 引自清・倪璠：《庾子山集注》，頁 128-13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中一個爭論在於：庾信若是出於回想寫下這篇賦，何以情感能如此強烈熾熱？[67] 但筆者認爲正是因爲此賦出於回想，所以庾信清楚知道建康與梁朝的覆滅已是不可逆的事實，而「城毀」與「國滅」，對於作者而言，成了二者合一的複合經驗。所以我們注意到庾信不僅在寫毀滅現場或今昔對比，而更是在寫「如何毀滅」的整個過程，寫通往壞空、由盛而轉衰的「轉」的動態敘事與動態建構之上。這與未經喪亂的作者描寫名城毀壞非常不同，而這樣通往毀滅的敘事延續到顏之推，就成爲擺盪於「有咎」和「無咎」之間的自我詰問。

2. 顏之推〈觀我生賦〉

顏之推〈觀我生賦〉題意來自《易．觀卦》九五的爻辭：「觀我生，君子無咎」，[68] 全賦主旨應該就是顏之推自注「至此而三爲亡國之人」，對照賦末的「不敢怨天而泣麟也」，「無咎」可能有反諷義，顏之推對於親身所經的國破家亡，若不得怨天，或許也只能尤己。臺靜農說顏之推此賦極類〈哀江南賦〉，[69] 除了敘述同一段歷史事實外，顏之推用了許多令人聯想到〈哀江南賦〉的句子，[70] 然而從本文談的毀滅敘事來看，顏之推不僅像庾信般書寫通往毀滅的過程，〈觀我生賦〉顯得更爲曲折、迂迴，充分展現出作家面對亂世的悲喜起伏的快速更迭。而這樣的無常被反覆敘述時，我們感受到一股近乎於自

---

67 魯同群談〈哀江南賦〉時認爲：「以常情而論，一個人國破家亡的痛苦應是在事情初發生之時或其後不久最爲巨大，時間漸久，則創痛漸平。」魯同群：《庾信傳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年），頁 104；李錫鎮則反駁此論說：「庾信在事隔二、三十年之後，才寫成情感強烈的〈哀江南賦〉亦不足爲異。」李錫鎮：《庾信〈哀江南賦〉的批評與詮釋》（臺北：三通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頁 72-73。

68 清．阮元：《重刊宋本周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2003 年），頁 60。

69 臺靜農說：「沈炯的〈歸魂賦〉影響了庾信的〈哀江南賦〉，庾信的賦又影響了顏之推〈觀我生賦〉，顏賦中的用事及句法與庾賦符合處，極類〈哀江南賦〉之與〈歸魂賦〉。」氏著：〈庾信的賦〉，《臺大中文學報》第 5 期（1992 年 6 月），頁 23。

70 像「實兄亡而弟及」、「子既損而姪攻」，都與〈哀江南賦〉「三世爲將，終於此滅」、「兄弟三人，義聲俱唱」很類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虐[71]的感傷。

拿以下兩段來說，其一是在寫侯景復來攻城而終於攻陷建康之景；其二是寫蕭繹力圖重建而無功、江陵君臣北虜西魏之事，這都是從都城建康毀滅當時和其後的紀實，讀來慘澹、殘暴而動魄驚心：

> 賊棄甲而來復，肆觜距之鵰鶚，積假履而弒帝，憑衣霧以上天。用速災於四月，奚聞道之十年！就狄俘於舊壤，陷戎俗於來旋。慨黍離於清廟，愴麥秀於空廛。蔈鼓臥而不考，景鐘毀而莫懸。野蕭條以橫骨，邑闃寂而無烟。……屠蚩尤於東郡，挂郅支於北闕。弔幽魂之冤枉，掃園陵之蕪沒；殷道是以再興，夏祀於焉不忽。但遺恨於炎崑，火延宮而累月。[72]
>
> 竚既定以鳴鸞，脩東都之大壯。驚北風之復起，慘南歌之不暢，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民百萬而囚虜，書千兩而煙煬，溥天之下，斯文盡喪。憐嬰孺之何辜，矜老疾之無狀，奪諸懷而棄草，踣於塗而受掠。冤乘輿之殘酷，軫人神之無狀。載下車以黜喪，揜桐棺之藁葬。[73]

第一段寫建康城破景觀，研究者認爲這顯示了人文地理學的「異常氛圍」，[74]當黍離之悲變成了傷痕經驗，而荒涼廢墟又透顯出抒情傳統，建康毀滅時的

---

[71] 關於顏之推「自虐」之論以及前文談庾信遭遇的不可逆創傷等論，請參閱拙著：〈魂兮歸來哀江南：論沈炯、庾信、顏之推的傷痕書寫與敘事美學〉，《清華學報》新45卷第4期（2012年12月），中有較完整陳述，頁640-649。此處重點並不在傷痕書寫，然而顏之推〈觀我生賦〉與〈哀江南賦〉最大差異即在「自注本事」，面對如此慘痛的國破、流亡經驗，卻以如此客觀、史傳敘事的口吻說明本事，幾乎有如自虐。

[72] 顏之推：〈觀我生賦〉，引自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頁596-599。

[73] 同前註，頁600-601。

[74] 彭定源提到：「顏之推祖籍瑯琊，爲顏氏家族流寓江南的第九代，從出生至九歲居於江陵，之後舉家遷住建康。……在建康長住八年之久，顏之推應對建康懷有一種特殊的情感。……因此目睹侯景亂後，建康繁華頓成一片廢墟，有一朝拔之的悲慨。」氏著：《前中古辭賦中的「江南論述」》（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鄭毓瑜先生指導，2008年），頁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遺恨於炎崑」、「火延宮而累月」，熊熊火焰吞噬之下，除了燒毀實質的建築與空間，也同時成了香煙斷絕、家國滅亡的意象。

更讓筆者重視的卻是第二段，時間已經推到了侯景亂平後的建康重建時期。對於「修東都之大壯」，顏之推顯然是充滿期待的，但事後證明了蕭繹早準備定都江陵。顏之推同樣是由後視昔，出於回想，從結果來看，他充滿期待的江陵政權「守金城之湯池」的力圖振作，最終不過是曇花一現。此段顏之推有自注：「初聞賊來，頗爲厭勝，[75] 被圍之後，每嘆息知必敗。」[76] 這講的雖然是梁元帝於江陵事，但那種伴隨喜悅而來的悲痛顯然格外強烈。我們知道，最令人難以承受的並非是一開始即注定的一敗塗地，而是這些「金城」、「大壯」云云的穩固而喜悅的敘事，到頭來卻還是淪爲「必敗」的結局。

這樣的敘事其實和鮑照寫「蕪城」的今昔對照，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前面的重建與安全，只是爲了映襯後面嬰孺老疾走向北方異邦，走向永無止盡的顛沛流離。還有什麼比這更加殘忍的嗎？看似回歸美好與安穩的敘事，其實是爲了再次的毀壞；猶若歸返平靜的修辭，實則爲了最終的衝擊。這是一種希望反覆幻滅的絕望，不可能終止的殘忍、災難與暴虐，瀰漫在顏之推〈觀我生賦〉之中，而這就是他所見證的：反覆而永無休止的眞實毀滅。王利器說兩賦面對變故的痛哭流涕，實爲庾、顏「競己棲而擇木」作辯解，[77] 或許忠貳選擇的是非，始終糾纏著這一代作者。但當毀滅反覆發生且被反覆敘述的同時，不正觸及了一個更永恆的命題——天道如何，吞恨者多。

庾信和顏之推並非沒有描寫靜好歲月的詠物寫景體裁，然而比起歌舞昇平之作，關於身經喪亂、家國毀滅的作品成了其代表作。這可能是「國家不幸詩

[75] 關於「厭勝」相關巫術等論題，請參酌黃靖惠：《唐代詩歌中節日厭勝研究》（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李時銘先生指導，2010 年），頁 9-36。無論方法，蕭繹一開始對西魏的攻擊確實曾有過抵抗，只是結果終於走向另一次的毀滅與浩劫。

[76] 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頁 601。

[77] 同前註，頁 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家幸」的舊說，然而毀滅若成了這一代梁末作家的城市經驗，那麼此敘事又存在著細微的異同，本文旨在釐清此點。相對於庾、顏將建康毀滅寫入作品，另外也有作家雖與建康毀滅時間重疊，卻未見證此浩劫，而書寫了其他空間的「地方感」，然而此地方感又隱然與建康毀滅有所關聯，如江總和沈炯。

（二）逃避在他方：江總與沈炯

1. 江總〈修心賦〉

根據《陳書》載，江總於侯景亂建康陷落之時，他「避難會稽郡，憩於龍華寺，乃製〈修心賦〉」。[78] 因此〈修心賦〉中或許沒有明顯的建康毀滅敘事，但它卻是創作於浩劫災難之際。離開了熟悉的空間，而想像原本生存場所的毀滅，這同樣是一獨特的經驗。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說：「人類生存的空間無關乎城市與否，總是深具意義的。」[79] 於是本文將〈修心賦〉視爲江總不在場的在場，而在此篇賦的序中，江總說明自己逃避災禍於龍華寺，且敘述此寺歷史沿革與其家族之關聯，可以說是對此空間的認知測繪：

> 寺域則宅之舊基，左江右湖，面山背壑。東西陵跨，南北紆縈。聊與苦節名僧，同銷日月。曉修經戒，夕覽圖書。寢處風雲，憑棲水月。不意華戎莫辨，朝市傾淪。以此傷情，情可知矣。啜泣濡翰，豈攄鬱結。庶後生君子，憫余此槩焉。（江總〈修心賦・序〉）

「宅之舊基」指的是江總的父祖輩江彪、江矱等人曾於此經營，後改建伽藍，家族的歷史空間和佛家的神聖空間於是有了疊合。此地東南西北背壑臨山，風雲水月，原本的世外隔絕的淨地，但江總到來時所帶來的並不僅是文人典型的隱遁之意，而是「華戎莫辨，朝市傾淪」這樣的毀滅實況，感傷、啜泣也隨之而來。

---

[78] 唐・姚思廉：《陳書》，卷 27〈江總傳〉，頁 344。

[79] Roland Barthes, “Semiology and the Urban”（符號學與都市），in M. Gottdiener and Alexandres ph. Lagopoulos, *The City and the Sign: an Introduction to Urban Semiotics*, p.8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修心賦〉若除去「朝市傾淪」這兩句對城市與家國毀滅的敘述，它基本上與〈閒居賦〉或〈山居賦〉在敘事視角與結構上沒什麼差別。但即便賦的正文寫隱居空間、寫於伽藍靜修的參徹體悟，但背後顯然有更大的背景脈絡：即序文中提到的「傷情」、「鬱結」，作者希望於此場所尋求解脫或修持。在賦的正文，江總以兩種敘事模式描寫龍華伽藍這個場所，而這兩種另類空間的書寫與建構，看似與都城毀滅敘事無關，但實則是作爲另一對照組，作爲毀滅發生時的另類聲音：

> 面曾阜之超忽，邇平湖之迴深。山條偃蹇，水葉浸淫。挂猿朝落，飢鼯夜吟。果叢藥苑，桃蹊橘林。梢雲拂日，結暗生陰。保自然之雅趣，鄙人閒之荒雜。望島嶼之邅迴，面江源之重沓。泛流月之夜迴，曳光煙之曉匝。風引蜩而嘶噪，雨鳴林而脩颯。烏稍狎而知來，雲無情而自合。……
>
> 異曲終而悲起，非木落而愁如。豈降志而辱身，不露才而揚己。鍾風雨之掩藹，倦鷄鳴之聒耳。幸避地而高棲，憑調御之遺旨。折四辯之微言，悟三乘之妙理。遣十纏之繫縛，祛五惑之塵滓。久遺榮于勢利，庶忘累於妻子。感意氣於疇日，寄知音於來祀。何遠客之可悲，私自憐其何已。（江總〈修心賦〉）

江總敘述了以上兩種類型的空間，一是「自然空間」，一是「佛理空間」，而這兩者與城市空間無關的景觀場所，最後還是回扣到「華戎莫辨，朝市傾淪」的災難經驗，那麼，這兩種空間：無論存在於眞實大自然的「山條偃蹇」、「梢雲結暗」；或存在於佛教儀軌或典籍的「經行持戒」、「堅固之林」，都是爲了同樣一目的——也就是對「十纏」、「五惑」的解脫與祛縛。「四辯」、「三乘」、「十纏」、「五惑」[80]不僅是作爲「事數」，[81]同時成爲作

[80] 「三乘」是「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三種境界，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頁 122。

[81] 此「四辯」、「三乘」皆屬事數，《世說新語》：「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數』處不解。」同前註，頁 2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者逃避毀滅和災禍的另類空間。在佛理領會中，「壞空」以另外一種型態被理解了。般若學講「色不自有，雖色而空」，[82] 依據湯用彤所說，外界諸「色」相固然是「空」，卻仍作爲現象，[83] 而解脫必須放進現象世界來證成。錢鍾書批評江總：「將誰欺乎！正恐其所奉佛法未必印可爲直心道場。」[84] 於是有研究者認爲〈修心賦〉的「私自憐其何已」表現江總仍爲利慾薰心之輩，歸心佛法僅一時權宜之計。[85] 但筆者認爲這未免太從江總其後的際遇來解讀這篇賦了。

筆者以爲，從〈修心賦〉似乎能讀出南朝作家特有的敏銳善感，許多時候他們情感豐沛，細膩而感傷。〈修心賦〉以佛理爲主題，理當要能看破「色」的壞空，但最後的「遠客可悲，自憐何已」告訴我們：作者仍離不開那份悲憐自憫。大概可以說「修心」對江總而言，只是面對災禍的暫時狀態。他沒法眞正脫離世間的「纏」與「惑」，但文學作品的藝術價值即在於——我們既然身而爲人，就必然得遭遇到外在世情的糾纏與迷惑；我們對解脫既存有幻想，卻又無法眞正脫解於外在色相。因此，即便江總的身體與心靈都逃避到了毀滅之外的空間，但「朝市傾淪」的現實仍深刻影響著他的行爲、情感與敘事。而另外一個身處他方卻與建康毀滅有關的作者則是沈炯。

2. 沈炯〈歸魂賦〉

沈炯〈歸魂賦〉寫於西元 555 年，此時梁、陳易代，他自長安南返，距離侯景之亂爆發已經過了六年，賦寫的是眞實經驗，但對侯景亂時的記憶卻是出

---

82 這是《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注所引的支遁對「即色而空」的觀點：「《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爲空，空復異空。』」同前註，頁 121。

83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180-181。

84 錢鍾書：《管錐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270》，頁 1546。

85 趙逵夫、湯斌：《歷代賦評注》（成都：巴蜀書社，2010 年），頁 573。這大概是從江總後來又事陳、隋二朝所作的評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於回想。在賦中沈炯寫妻、子於喪亂時被殺的情景，[86] 他僅以「余技逆而效從，遂妻誅而子害」兩句帶過，而以「我國家之沸騰，我天下之匡復」、「背盟書而我欺，圖信神而我戮」等六個有「我」之句敘述國家傾覆。顯然所謂「肌膚之痛」、「潛翳之悲」，已經脫離了沈炯的個人身世，成了一種國家的集體創傷，國仇與家恨緊密嵌合在一起，再難分開了。

據本傳載侯景圍建康城時，沈炯正值吳郡監郡，[87] 未能目擊建康城毀實況，故〈歸魂賦〉也沒有提及，但相對於庾信、顏之推的建康書寫，沈炯虜於西魏的經驗，讓他書寫了另外一足以對照建康的城市——「長安」。長安對沈炯來說是歷史的、文獻的都城，是大漢帝國京都辭賦的描繪重心，但沈炯見證的長安卻已淪入異邦，這是一種另類的毀滅，田曉菲說沈炯只願意認得「文本中的長安」，[88] 但筆者以爲更重要的是，想像中的長安易主，現實中的建康毀滅，當歷史、政治、認同和效忠國家有了複雜、盤根錯節的矛盾時，作者要如何來書寫眼前的和故鄉的兩座城市？沈炯這麼敘述長安：

> 長卿之賦可想，邵平之跡不存。咄嗟驪山之阜，惆悵灞陵之園。……登未央之北闕，望長樂之基趾。伊太后之所居，築旗亭而成市。槐路鬱以三條，方塗坦而九軌。觀阡陌之遺蹤，實不乖乎前史。傍直城而北轉，臨橫門而左趨。南則董卓之塢，北則苻堅所居。即二賊之墟壘，爲彼主之庭除。（沈炯〈歸魂賦〉）

「長卿之賦可想」、「實不乖乎前史」顯然是此段的重點，沈炯必然召喚了一脈漢帝國式的「西京想像」來對應眼前這座城市。他把叛臣董卓、夷君苻堅視爲「二賊」，這「二賊」又和眼下北方政權重疊起來，「爲彼主之庭除」，空間、歷史和政治情勢疊架在一起。象徵江南的都城建康已經毀滅了，北方政權

---

86 唐・姚思廉：《陳書》，卷 19〈沈炯傳〉：「京城陷，景將宋子仙據吳興，遣使召炯，委以書記之任。炯固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炯解衣將就戮。……及侯景東奔至吳郡，獲炯妻虞氏，子行簡，並殺之，炯弟攜其母逃而獲免。」頁 253-254。

87 同前註，頁 253。

88 田曉菲：《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化與文學》，頁 2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卻意外保留了帝國遺跡：未央長樂，三條九軌，這些宮殿通衢不但猶在，更沒有如江南都城那樣毀圮。沈炯的長安經驗讓他有了印證前代京都賦的機會，然而帝國版圖不再，政治現實遞變，對場所的觀看與敘述雖然讓沈炯有機會鋪寫他自己的西京賦，只是這座城市被重述時，多了一層嫉妒與感傷的反諷。長安淪喪於異族之手，這已不是新亭對泣時「風景不殊，山河之異」[89]的感傷，就連「風景」對沈炯而言都不忍卒睹了。

但沈炯此賦賦題名「歸魂」，這不僅向《楚騷》致敬，江南是他的身體魂魄都必須歸返的所在，即便象徵江南的國家與城市已經毀棄。其實沈炯並非對南歸毫無疑慮，就像在南歸之際詩中所寫的「舊識莫不盡」，[90]此時沈炯「初歸欣喜已完全泯滅，變成了深刻的失落與悲哀」。[91]〈歸魂賦〉的末尾將江南空間描敘成了仙境：「何神仙之足學，此即雲衣而虹裳」。[92]其中當然可能有對新政權宣示效忠的意圖，但更重要的是，沈炯的「長安／江南」成了對照的空間，象徵江南政權的建康毀壞了，而象徵漢帝國的長安淪入異族，城市、場所或國家的毀滅是眞實的、毫無疑問的，於是對江南的嚮往被美化成有如仙境。

相對於庾信、顏之推，江總和沈炯的毀滅敘事是一種反身性的，逃避或偏移的建康書寫，但它們同樣來根源於建康毀滅的歷史事實。換言之，「建康毀滅」的這個歷史事件，確實地影響了梁、陳之際的辭賦，只是作家因其立場、所處空間、心態與對創傷的不同反應，而展現了不同的面向與敘事。但無論他

89 《世說新語》：「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世說新語箋疏》，頁 92。

90 這是沈炯〈長安還至方山愴然自傷詩〉裏的句子，詩曰：「秦軍坑趙卒，遂有一人生。雖還舊鄉里，危心曾未平。淮源比桐柏，方山似削成。猶疑屯虜騎，尚畏值胡兵。空村餘拱木，廢邑有頹城。舊識既已盡（《藝文類聚》作「莫不盡」），新知皆異名。百年三萬日，處處此傷情。」引自清・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2445。

91 田曉菲：《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化與文學》，頁 294。

92 引自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34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們親歷災禍與否，建康與整個江南的毀滅已成現實，無論是「君子無咎」或「私自憐」，都在在顯示出作家所受都城毀滅的影響痕跡罷了。

五、結語：城市書寫與毀滅敘事的關聯

「城市」的符號與象徵或許是文化研究所關注的課題，[93] 但本文並非要用當代文化論述來談城市或空間，而是發現到，對南朝辭賦而言，鋪衍都邑的雄壯宏偉，或許不再是他們傾向的主題。作者以華麗的敘事來呈顯荒城廢都，以繁盛安全的形象勾勒都城，但當都邑毀滅之後，又轉以將親身經歷融合典故、想像與記憶，建構都城毀滅的實況或逃避他方的側寫。而這種種的書寫都構成了一種「另類」的都邑主題辭賦。因此，文學史認爲的南朝趨向抒情小賦，實則忽略了都邑主題一直存在於南朝辭賦當中。本文即從城市都邑此一題材展開思考，綜合上述，提出三點結論：

（一）南朝出現了另類的都邑賦，
在描寫華麗與毀滅的因果關係。

從典型的都邑賦來說，前面提過南朝僅存夏侯弼、蕭子範的辭賦，而像「亞於庾闡」的曹毗〈揚都賦〉整篇亡佚了。除了數量減少之外，南朝出現了另外一種形貌的都邑賦：作者不再以體國經野、鋪天蓋地描寫城市的雄偉，而是讓城市的華麗與頹圮交互出現，互爲因果。在吳均〈吳城賦〉中陰森晦暗的

93 過去傅柯（Mechal Foucault）就有一系列討論空間與權力的論述，除前面徵引的 M. Gottdiener& Alexandros Lagopoulos 和 Roland Barthes 論著之外，如 Pierre Bourdieu,” Social Space and Symbolic Power”（社會空間與象徵權力）, *Sociological Theory*, Vol.7, No1, 1989, pp.14-25; Manuel Castells,“The Urban Symbolic , Urban Centrality”（都市象徵和指標）, in *The Urban Questio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77), pp.215-221; Manuel Castells,“A Cross-Culture Theory of Urban Social Change”（關於都市社會變遷的跨文化理論）,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fornia Press, 1983), pp. 289-366.都在討論都市、空間以及象徵等問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描述景觀，瀰漫於吳城這座廢都；而鮑照〈蕪城賦〉裏，歌聲、器玩和美人被以極鋪張極華麗的視角描寫出來，卻注定被摧毀，見證歷史法則中一座城市的「瓜剖豆分」。或許過去漢代京都賦的雄偉恢宏，不再是南朝辭賦家唯一的書寫策略，而南朝作家以華麗和華麗之後終將到來的毀滅敘事，展現了他們這個時代的另外一種都邑賦之樣貌——這種毀滅感當然與時代背景有關。

（二）在災禍發生前的建康書寫，仍著重於城市的繁榮與「金陵王氣」。

金陵自古有「王氣」之說，但到了唐代「王氣」成了一種反諷性意象，而這樣的翻轉就在於建康城的毀滅。我們可以發現在都城罹亂之前，作家敘述的建康仍是安全、繁盛的，龍蟠虎踞、長江天險。江河等「水」勢成了南朝帝國被描敘時重要的文學意象與軍事國家實力，是雄偉浩壯的，但到了唐詩「隔江猶唱後庭花」、「依舊煙籠十里堤」等詩句中，水勢再無波瀾壯闊的防禦或安全意義，而成了夢幻而感傷的意象。從「建康書寫」來看，這是很明顯的差異。對唐朝作家而言，建康和其象徵的江南經常以「感傷的」或「夢幻的」形象存在；但對南朝作家來說，建康和江南都是他們眞實身處的空間，而此書寫的差異、從繁盛安全轉向消逝感傷的關鍵——正是建康城毀的歷史事件。

（三）在建康毀滅後作家無論親歷與否，其辭賦皆受到都城毀滅的影響

如果說侯景圍建康終至攻陷此一事件，對於每一個身處梁、陳之際的作家都是一次重大的浩劫，是不可逆的創傷經驗，那麼都城毀滅的影響是非常廣泛的。本文舉出四個身世逢喪亂的作家作爲例證：庾信、顏之推、江總、沈炯，因他們身處的空間、政治位置、心態和對創傷經驗的反應不一，於辭賦中也有了不同的敘事策略，〈哀江南賦〉寫建康遭圍至城破一段，以典故來隱晦其事；〈觀我生賦〉寫建康城破、寫蕭繹力圖復興卻徒勞，從毀滅到期待再到永無止盡的毀滅，成了最深刻的毀滅敘事；而江總避禍與沈炯監郡，兩人並未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身歷劫，江總避居寺院，以自然空間與佛教空間作爲逃避現實災禍的法門；沈炯見證了淪爲異族統治的長安，南方的都城在實質意義上被摧毀了、北方的都城在族群認同上淪陷了，於是他只能將江南比擬成仙境，宣稱這是他無論生死都要魂兮所歸的故土。

南朝千古傷心事，此後，「南朝」也就從作者眞實生存的時代與空間，變成了一個文學意象，在後代作者的建構中，象徵著感傷、毀壞與消亡，進入了文學史之中。有研究者以「世紀末的頹廢」[94] 來稱之梁、陳，本文並不全然同意這樣的推論，畢竟南朝的經濟政治格局，都與工業革命後發展出城市經濟的巴黎、倫敦有所差別。但就像五代的睡仙陳摶能夠預言朝代興替這般，[95] 南朝作家或許也多少感受到自己身處國勢的危如累卵，因此其辭賦中，華麗與毀滅交互呈顯，殘忍、悲愴與期待輪流串演。建康的毀滅於是不僅僅是一個歷史事件，透過辭賦的敘述和鋪排，展現出當時文人細膩的見聞、心理與感受。而正是透過辭賦，得以更感性的視角，來解讀這一個動盪而具有毀滅感的時代。

（責任校對：傅凱瑄）

94 陳大道即將十九世紀波特萊爾、王爾德等代表的「世紀末」、「頹廢」美學用以比擬梁陳文學，陳大道：《世紀末閱讀宮體詩之帝王詩人》（臺北：雲龍出版社，2002年），頁 13-40。但「世紀末」乃是後設的概念，梁、陳版圖限縮、政治軍事權力衰弱雖是事實，但身爲當代的作者是否意識到正在創作唯美、頹廢的所謂「世紀末」風格，這恐怕未必。就筆者看來，蕭綱或陳叔寶的宮體詠物，此即生活生命經驗的一部分，不若歐洲十九世紀末之象徵主義脈絡。

95 清・丁傳靖：「陳圖南（摶）有經世才，生唐末，厭五代之亂。……自晉漢以後，每聞一朝革命，則嘯蹙數日。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人相語曰：『趙點檢作官家』。摶驚喜大笑，人問其故，又笑曰：『這回天下定疊也』。」清・丁傳靖：《宋人軼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1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

晉・陳壽：《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79 年。

劉宋・劉義慶著，梁・劉孝標注，清・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

梁・劉勰著，黃叔琳注：《文心雕龍注》，臺北：世界書局，1984 年。

北齊・顏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

唐・房玄齡：《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

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年。

唐・姚思廉：《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宋・李昉：《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年。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年。

宋・周應：《景定建康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清・倪璠注：《庾子山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重印。

清・阮元：《重刊宋本周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2003 年。

清・董誥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清・丁傳靖：《宋人軼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

清・逯欽立輯：《先秦漢魏南北朝詩》，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近人論著

王文進：《南朝邊塞詩新論》，臺北：里仁書局，2000 年。
＊王文進：《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臺北：里仁書局，2008 年。
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 年。
王欣慧：《歷代京都賦的文化審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簡宗梧先生指導，2010 年。
王根林：《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王德威：《一九四九：傷痕書寫與國家文學》，香港：三聯書店，2008 年。
王　毅：《園林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
＊田曉菲：《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學與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
李錫鎮：《庾信〈哀江南賦〉的批評與詮釋》，臺北：三通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朱　楔：《金陵古跡圖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
朱曉海：《習賦椎輪記》，臺北：學生書局，1999 年。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臺北：學生書局，1997 年。
祁立峰：〈經驗匱乏者的遊戲：再探南朝邊塞詩的成因〉，《漢學研究》第 29 卷第 1 期（2011 年 3 月），頁 281-312。
祁立峰：〈魂兮歸來哀江南：論沈炯、庾信、顏之推的傷痕書寫與敘事美學〉，《清華學報》新 45 卷第 4 期（2012 年 12 月），頁 625-656。
高莉芬：〈水的聖域：兩晉江海賦的原型與象徵〉，《政大中文學報》第 1 期（2007 年 12 月），頁 113-148。
＊許　結：《賦體文學的文化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黃靖惠：《唐代詩歌中節日厭勝研究》，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李時銘先生指導，2010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陳大道：《世紀末閱讀宮體詩之帝王詩人》，臺北：雲龍出版社，2002 年。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程章燦：〈金陵王氣（上）〉，《古典文學知識》第 1 期（2002 年 1 月），頁 73-77。
程章燦：〈金陵王氣（下）〉，《古典文學知識》第 2 期（2002 年 2 月），頁 54-58。
彭定源：《前中古辭賦中的「江南」論述——以《楚辭》、〈山居賦〉、〈哀江南賦〉爲主的討論》，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鄭毓瑜先生指導，2008 年。
趙逵夫、湯斌：《歷代賦評注》，成都：巴蜀書社，2010 年。
廖蔚卿：《漢魏六朝文學論集》，臺北：大安出版社，1997 年。
魯同群：《庾信傳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年。
魯　迅：《古小說鉤沈》，香港：新藝出版社，1967 年。
臺靜農：〈庾信的賦〉，《臺大中文學報》第 5 期（1992 年 6 月），頁 21-23。
＊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 年。
錢鍾書：《管錐編（四）》，臺北：書林圖書公司，1990 年。
＊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 年。
盧海鳴：《六朝都城》，南京：南京出版社，2002 年。
Joel Kotkin 著、謝佩妏譯：《城市的歷史》，臺北：左岸文化事業公司，2006 年。
＊M. Gottdiener and Alexandros ph. Lagopoulos, *The City and the Sign: An Introduction to Urban Semiotics*（城市與符號：都市符號學導論）,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Manuel Castells,“A Cross-Culture Theory of Urban Social Change”（都市社會變遷的跨文化理論）,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Berkeley: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of Calfornia Press, 1983, pp. 289-366.

Manuel Castells,“The Urban Symbolic , Urban Centrality”（都市象徵和指標）, in *The Urban Questio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77, pp.215-221.

＊Mike Crang 著，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 年。

＊Richard Lehan, *The City in Literature*（文學中的城市）,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Roland Barthes,“Semiology and the Urban”（符號學與都市）, in M. Gottdiener and Alexandres ph. Lagopoulos, *The City and the Sign: an Introduction to Urban Semio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87-98.

＊Stephen Owen 著、鄭學勤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6 年。

Pierre Bourdieu,“Social Space and Symbolic Power”（社會空間與象徵權力）, Sociological Theory, Vol.7, No1, 1989, pp.14-25.

（**說明**：書名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Cheng, Y.-Y. (2005). *Wen ben feng jing: Zi wo yu kong jian de xiang hu ding yi* [*The poet in text and landscape: Mutual definition of self and landscape*]. Taipei: Rye Field.

Crang, M. (2003). *Wen hua di li xue* [*Cultural geography*] (Wang Zh.-H., Trans.). Taipei: Chuliu.

Gottdiener, M., & Lagopoulos, A. Ph. (1986). *The city and the sign: An introduction to urban semio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ehan, R. (1998). *The city in litera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iu, Sh.-F. (1998). *Liu chao de cheng shi yu she hui* [*Cities and the society of the Six*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ynasties]. Taipei: Student.

Owen, S. (2006). *Zhui yi: Zhong guo gu dian wen xue zhong de wang shi zai xian* [*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Zheng X.-Q., Trans.). Taipei: Linking.

Tian, X.-F. (2010). *Feng huo yu liu xing: Xiao liang wang chao de wen xue yu wen hua* [*Beacon fire and shooting star: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Liang*]. Beijing: Zhonghua.

Wang, W.-J. (2008). *Nan chao shan shui yu chang cheng xiang xiang* [*Southern Dynasties landscape imagination with the Great Wall*]. Taipei: Le Jin.

Xu, J. (2005). *Fu ti wen xue de wen hua chan shi*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u* genre]. Beijing: Zhonghua.

Yan, K.-J. (Ed.). (1991). *Quan shang gu san dai qin han san guo liu chao wen* [A complete anthology of writings in the Xia, the Shang, the Zhou, the Qin, the Han dynasties,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and the Six Dynasties]. Beijing: Zhonghua.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